

《深海危机》： 反恐题材影片的新拓展与新突破

■文晓曙光

“合法性”。正如导演沈东所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承担起惩恶扬善、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荣职责。”

作为一部反恐军事题材影片，《深海危机》颇具野心地将叙事背景置于全球语境。影片从“冷战时期遗留的核弹”这一线索出发，串联起多个国家和地区，呈现全球语境下的“深海危机”。这种背景设置，不仅是对中国电影国际化叙事的积极探索，也是对中国反恐“力量”和“方案”影像化转化的有力尝试。

除此之外，《深海危机》在类型化的探索上也独具匠心。不同于过去大多数军事题材影片，《深海危机》对类型化的处理，并未拘泥于严肃的战争、军事描写，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些许诙谐元素。如影片中吴昊宸和艾晓琪所饰演的一对欢喜冤家，便为影片增加了诸多笑点。这种艺术表达，不仅使得影片所蕴含的情绪更具张力，也更能契合当下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心理。

在类型化的总体要求下，《深海危机》用大量笔墨刻画了惊心动魄的动作场面。但不同于传统动作片，《深海危机》的动作场面设计，一是刻画难度大，可以看到，片中所有演员都非职业动作演员，但在创作者的精心设计和严苛要求下，片中的打斗场面近乎拳拳到肉。并且，随着对峙的升级，影片的打斗难度也不断升级，创作者时常把近身格斗与飞车追逐、爆破爆炸等场面相叠加，以此让观众创造真实且震撼的视听感受。二是场面丰富度高，影片对动作场面的塑造并未局限于单一的近身格斗，而是颇具想象力地刻画了海滩近身肉搏、公路摩托追击、悬崖极限拉扯、深海下潜营救等多个动作场面，营造出了危机四伏的紧迫感。三是动作可视性高，影片对格斗场面的塑造，在追求真实的同时，还辅以“暴雨剪辑”的创作手法，即通过快如闪电的剪辑法，使动作场面呈现为连珠炮似的电影速写镜头，进而提升动作场面的速度感和力量感。

作为一部以现代为背景的反恐题材影片，《深海危机》在精雕细琢传统动作场面基础上，还借助高科技手段，向观众呈现出以往同类型影片较少表现甚至未曾表现的现代战争奇观，无论是深海核弹追击，还是空中战机对垒，抑或是海上舰船交锋。这些场面壮烈的战争奇观，不仅令观众获得了撼人心魄的视听体验，更彰显了我国军队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背后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深海危机》对暴力、奇观场面的呈现并未受制于表层的类型法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内在审美追寻、艺术化有效呈现依然是其核心议题。可以看到，影片不仅通过动画模拟的方式向观众客观呈现了核弹爆炸给沿海数十个国家带来的灭顶危机，还在不同段落铺设了大量壮美的风光类空镜，

以此作为对比，不断提醒观众和平的珍贵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而和平本身，就是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要义。

《深海危机》在人物塑造方面，也颇具新意。不同于许多军事题材影片主人公铁血硬汉般的“孤勇者”形象，《深海危机》将镜头聚焦于林湛、夏苏这对夫妻。这种人物形象塑造，首先充分彰显了女性力量。众所周知，在国际反恐事业中，女性一直“巾帼不让须眉”。但在相关题材的影片中，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影片却较为稀少。而《深海危机》一改常态，选择用大量笔墨刻画夏苏这一女性公安干警形象，生动展现其不畏艰险，全力捍卫国家和人类利益的英勇壮举。从这一人物身上观众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国女性反恐人员的巾帼风采和英勇气魄。

其次，这种人物形象设置，也在叙事功能上将以往单纯“英雄”化的军人形象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可以看到，影片中无论是夏苏还是林湛，都通过各类英勇壮举展现出了中国军人和反恐作战人员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如夏苏孤身闯入敌军海上基地，林湛只身潜入海底追击核弹等。但不同于过去许多军事题材影片，创作者并未止于对这些英勇壮举的展现，而是详细追溯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线索，生动刻画了林湛和夏苏之间的夫妻情，以此将难以置信的惊天壮举和扎实可信的人物情感相融合。这不仅使人物的行为更加真实可信，也更能让影片与观众产生共情、共鸣与共振，进而建立起共同体美学。

除却主人公，影片还着重刻画了王海泉、李辛雨、参谋长、国安首长等一批人物，并以国家利益作为隐形纽带串联起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以此让影片中的人物行为与国家意志相关联。这种艺术表达，有效突显和传递出了影片所蕴含的主流价值和国家形象。

相较于同类型影片，《深海危机》的制作成本并不高。正如该片监制黄建新所言：“这部资金有限，算是B级片的一种探索。”但即便资金受限，创作团队也力求做到每个细节都能尽善尽美。如在剧本方面，《深海危机》为了追求极致，创作历时多年，几经修改和打磨，付出了超常规的汗水和艰辛；在服化道方面，《深海危机》力求每个细节都做到贴近真实，创作团队不仅1:1搭建了船舱、作战指挥所等重要场景，还通过视效技术为观众真实还原了无人机、战机、舰艇、导弹系统等各类现代化军事武器和装备。

诚然，《深海危机》在人物关系塑造和后期声音处理等方面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但总的来看，影片无论是在艺术表达层面，还是在视听品质层面，都实现了反恐题材影片的新突破，是一部诚意满满且具有标志性、范本性意义的佳作。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历史与美学的「双重叙事」

——评『红色诗史』电影《征程之星火》

■文注帆

本留学为条件诱降，均被林青凛然痛斥。

从林青真实的历史来看，他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到一高当学徒，15岁时因不堪老板虐待逃到重庆，此后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坚定信念，历经艰险辗转赶到遵义，在遵义找到了昔日“狱友”——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吴亮平，经引见，林青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罗迈）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李维汉代表党中央充分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同时兼任遵义县委书记。贵州省工委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党组织。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工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码本，交给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做出了贡献。同时，林青又将遵义带回来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传红军、宣传抗日。

1935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属调查科利用一名叛变分子（剧中陈梯庐），大肆破坏中共党组织在贵州的革命活动。因叛徒出卖，同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敌人得知抓捕到贵州省工委书记后，威逼利诱不成后又对他施以酷刑，妄图从林青口中获取重要情报，一网打尽整个贵州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折磨，林青始终谨记入党宣誓时那句“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地向敌人展示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甘愿为党的事业献身的革命气节。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判处林青、刘雪苇（剧中刘茂龙）死刑。在狱中，林青曾有一次逃狱的机会，但他却以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命令刘雪苇越狱，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革命战友。

1935年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行刑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牺牲时年仅24岁。

编剧赵伟作为毕节人，他选取林青作为传主，必然会以毕节人的视角予以审美观照，同时又将主人公放置在宏阔的历史漩涡里，在典型的历史时空中的塑造，还在北京让众多专家学者研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全景纵览 毕节视角

影片的片头，可以看作是影片讲述故事的“序章”，在推出片名前，我们看到了历史座标的纵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31年上海，林青等五位进步青年入党宣誓。

时间的纵轴一下推到了1935年7月，国民党毕节特派员陈梯庐（又名陈资平）指挥便衣警察、特务四处搜查抓捕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地下党员刘茂龙去交通站截缝铺冒死传递信号，被敌人逮捕入狱；地下党员李策看到“信号”，火速跑去报告。林青得知后非但没有逃避，反而昂首走向特派员会客厅。陈梯庐先是以恭维其“书画双绝”求其墨宝，后又以高官厚禄、许诺林青去日

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特殊性格，曲青山总结出一条规律：“全景式、大跨度的事迹与精神的‘双重叙事’。”而诗意的呈现历史本质和精神向度的“双重叙事”，则是以影视剧创作为代表的视听艺术的美学遵循。

“套层结构”是《征程之星火》的主要叙事方式，影片要在96分钟的时间长度中，集中讲述林青从1935年7月19日被捕入狱，至1935年9月11日英勇就义止，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无狱中斗争生活已无多少故事可挖，编导巧妙运用“套层结构”展开“双重叙事”，以林青狱中遍体鳞伤，在监狱地铺上与狱友刘茂龙交流、回忆一生中最爱的几个人和最难忘的几件事……，以闪回场景依次呈现，为观众描述了林青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从中呈现和揭示出林青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贵州省早期领导人的伟大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境界。

庆祝建党百年的电影《革命者》，也是运用了“套层结构”的“双重叙事”。影片编导演匠心独运，用李大钊牺牲前38小时的时空限定，一反常规人物传记影片线性表现手法，用多个主观视角平行并联叙事结构、以蒙太奇电影手法将多种不同视角下的回忆片段统领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网格中。这种叙事结构的优势是，在特定艺术语境下，主人公于行刑前38小时的心理活动应该是异常复杂、丰富、浪漫而多彩的。在38小时的特定时空中，由此而引出的任何心理活动、人物回忆、场景回忆、情感回忆都是符合艺术逻辑和生活逻辑的。而影片编导按照历史逻辑选择的回忆片断不仅可以纵横捭阖，而且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在观影中，当我们发现、领悟、习惯了编导的这种叙事策略和叙述结构之后，便会瞬间觉出这种“形散神聚”的散文诗化表现方式的高妙奇绝。

通过上述两部表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史英雄的传记影片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异同点，尽管都运用了“套层结构”“双重叙事”手法，但是，《革命者》侧重于“散文诗化”、“形散神聚”的表现方式，而《征程之星火》则呈现出“诗意风格化”展现的审美风格。究其原因，一是主人公林青多才多艺，不仅“书画双绝”，而且具有诗人情怀，生前创作了大量诗词，“诗言志、歌咏言”，每当生离死别、动情之处都有诗作产生，影片中也有多处情节展示；二是编剧赵伟也有自己的诗意人生，影片中的几段民歌以及片尾主题歌词也是他的创作；三是贵州自然风光旖旎，毕节山水风景怡然，为这里的生灵赋予了诗情与画意。因此，诗情画意成为这部影片的一大艺术特色。我们之所以欣赏这部“红色诗史”电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美学原因，这就是“诗意的呈现历史本质和精神向度”。

这部影片的编剧、出品人赵伟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贵州人。他曾不止一次的向我讲述过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省的众多可歌可泣斗争故事，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和几个同乡同学一起闯深圳，得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在红军故事、先辈精神、红色基因的传播影响下，自己投资数千万拍摄了电影《征程之星火》，还正在拍摄纪录片《乌江》，他根据自己的青春经历正在创作一部励志文学作品，也准备拍成影视作品。今天，赵伟奉献给我们的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看到了党史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力量，愿我们心驰神往的多彩贵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浸润下更加多彩！

(作者系河北省影视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

